

川大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卷

川大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 **卷**

杨天宏 主编
杨兴梅 副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近现代史 

川大史学

杨天宏 主编 杨兴梅 副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庄 剑 杨天宏 杨兴梅(特邀)
责任校对:杨兴梅(特邀) 蔺翠翠(特邀) 吴雨时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卷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95-2

I. 川... II. 四... III. ①史学-文集②中国-近
代史-文集③中国-现代史-文集 IV. ①K0-53②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068 号

书名 川大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卷

主 编 杨天宏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180.25
字 数 423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1 300 册
定 价 450.00 元(全七卷)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 政 编 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 址: 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冉光荣	石	硕	孙锦泉	刘复生
任新建	何一民	何	平	罗志田	陈廷湘
杨天宏	徐亮工	郭	齐	彭裕商	舒大刚
蔡崇榜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应平	孙锦泉	李德英	陈廷湘
杨秀春	徐开来	舒大刚	鲍成志	霍 巍

秘 书：辛 旭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挾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挞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色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铤、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前 言

从 1896 年清政府在四川创办中西学堂开始，四川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 110 年的艰难历程。

历史专业是四川大学最早建制的学科专业之一，在学科发展史上，大师云集，成果丰硕，影响及于海内外。但是学科内不同研究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中国古代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古文字学、考古学研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为学界瞩目。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则起步稍晚。教学方面，川大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大约在 30 年代才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开始正式设置。30 年代中期的课程表显示，曾经就读于北师大本科及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的张景汉教授担任该门课程的教师。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蜀中院校棋布，徐中舒先生以武汉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为蓝本，补充修订，编写了一套中国近代史讲义，用于历史专业教学，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自编教材。科研方面，如果不拘泥于传统的学科分类，徐中舒先生在 30 年代参与的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研究，任乃强教授从 1929 年起三次前往西康展开的民族、宗教及社会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西康图经》，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及边疆研究所葛维汉、李安宅等分别从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开始的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的调查研究，由于研究的时段相对晚近，都应该是十分卓越的“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

1949年之后，因“厚今薄古”观念的提倡，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研究受到重视。在新的意识形态的指导规范下，“封建的”考据史学以及“资本主义的”实证史学受到批判，历史研究在整体上改变了自近代提倡“新史学”以来的发展方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的学术文化局面。川大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发展亦不例外。50年代中期，王介平、李世平两位先生先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近代史研究生班学习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回校后从事所习学科的教学研究，为川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沿着当时国家要求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王介平先生在50年代发表的有关梁启超思想研究的论文，已显示出一定的思想与学术水准。但如同其他学科专业一样，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科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受到来自学术之外的诸多限制和干扰。斯时诸位学科开创者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历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后来学科专业人才辈出，应当与这一阶段的培育有关。科研方面，除了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的搜集整理，巴县档案的保护发掘，四川义和团及近代教案资料的整理编纂及社会调查等基础性的工作之外，可记述的不多。

1976年，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化，高校的教科研逐渐走上正轨。到80年代中期，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除了老一辈的王、李二先生之外，已汇聚了隗瀛涛、王庭科、赵清、匡珊吉、沈传经、戴执礼、李润苍、郑诚、刘传英等一批学养深厚、在学术界具有影响的先生。隗瀛涛教授出版《四川保路运动史》并参与主编《辛亥革命史》，李世平教授出版《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王庭科教授出版《红军长征研究》，是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全国性学术影响的开始。这期间，火继薪传，陈廷湘、王笛、谢放、何一民等先后在本校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从事教学研究，“中生代”学者逐渐成为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中坚力量。

学科队伍扩容的同时，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80年代至90年代初，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最重要的学术发展是隗瀛涛教授及其带领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在城市史和区域社会史领域开拓性的研究。标志性成果是隗教授主编的《重庆城市史》和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隗教授领衔开展城市史研究，独辟蹊径，在理论和方法上较之同期其他学术机构所作研究有着自身特色，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结构与功能派”。王笛的论著资料扎实，见解精到，成为川大培养的“中生代”学者在学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何一民教授所作有关成都城市史的研究，拓展了隗教授所作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范围。除了近代城市史和大范围的区域社会史之外，赵清教授从事的四川秘密社会史研究，赵清、郑诚共同从事的吴虞与新文化运动研究，沈传经的洋务运动研究，戴执礼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研究，匡珊吉的四川军阀研究，王庭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李润苍的章太炎研究，刘传英的四川巴塘教案研究，陈廷湘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谢放的清末新政及四川近代经济史研究，曾瑞炎的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也颇受学界关注。

从学术特征上看，这一时期川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经历着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传统向“现代性”和“国际化”学术的转型。一些教师——如陈廷湘教授和王笛教授——在汲取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以形成新的学术范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做了积极探索。陈廷湘教授所著《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思路宏阔，以思想文化的自身逻辑谈思想文化，改变了此前该领域研究中的政治化倾向，为后来学者从更新的学术视野认知中国新文化思想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学术借鉴。在此期间，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学科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4年，曾经在川大就读历史专业本科（1977级），后来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罗志田回到川大工作，受聘教授。罗志田教授研究视野广阔，学术底蕴深沉，有着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学术交往，主要致力于近代中国文化史与学术史的研究。到川大之后，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推出了大量后来收录在《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国家与学术》等文集里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罗志田教授的到来，使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风愈加笃实，眼界愈加宽阔，加强了川大人与国内外主流学界的联系，壮大了学术队伍，大大提升了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2000年以后，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术队伍有所代谢。除了继续留在川大的教学研究人员之外，从川大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杨天宏教授，以及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陈旭麓先生、后来留学日本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刘世龙教授相继受聘川大，从事教学科研。杨教授的《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在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建树独到；刘教授的《清季产业行政与中国的工业化：以商部及农工商部之产业振兴为中心》（日本溪水株式会社2003年日文版），“对于清末产业行政首次做了系统研究”，以其“缜密的思考、广泛的引用、犀利的分析与系统的综合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二人的加盟，进一步充实了川大的学术队伍。而年轻一些的俊秀如徐跃、李德英、王东杰、杨兴梅、谯珊、范瑛等教师皆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精英迭出。他们的聪明智慧以及凭借其智慧所做出的学术抉择，加上持之以恒的辛勤劳作，将决定和促进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未来的学术走向和发展。

值此 110 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应同人之请，兹将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教师历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拮取精粹，都为一卷，以做总结。从学术角度言，一本 40 余万字的论文集，要反映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经历了几个不同时代的学术发展，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且按照学院的要求，凡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过的教师，都尽可能每人选取论文一篇，以展示学科队伍之状况，因而本文集实乃教师个人学术精品之集粹。由于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很大，一些多年前写就的论文虽不一定符合今日的学术规范，却能如实反映论文发表当时较为普遍的学术旨趣，具有学术史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全部原文照录，一字不易。

搜集选编历年的学术论文是一项繁难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学院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与配合，对此深表感谢。我们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在学校 110 年华诞之际，勾起川大学人的学术记忆，从中激发出追求更新更高学术境界的动力，共同写就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有传承价值的未来学术史。是为序。

编 者

2006 年 5 月

目 录

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批判	王介平(1)
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近代化——以四川为例	隗瀛涛(38)
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与中国党的“左”倾错误.....	王廷科(55)
中国人口史的分段研究刍议.....	李世平(82)
中国军事近代化研究.....	赵清(94)
章太炎是什么派?——与唐振常同志商榷.....	李润苍(126)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四川人民的觉醒.....	匡珊吉(151)
左宗棠是林、魏的后继者	沈传经(169)
反封建礼教的斗士吴虞.....	郑城(176)
巴塘藏族反洋教斗争述论.....	刘传英(192)
刘光第的爱国思想及其与维新派之区别	张修云 胡显慧(227)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	罗志田(242)
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	王笛(254)
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样形态及形成原因	陈廷湘(312)
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	杨天宏(356)
张之洞与戊戌政制改革.....	谢放(395)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曾瑞炎(421)

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政府的振兴产业政策	刘世龙著 陆梅、刘红译(454)
论李叔同.....	徐 跃(500)
学术的良知和严谨——梁启超年谱和手迹校读感言	吴铭能(522)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历史追求	柯继铭(530)
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 全国与四川.....	王东杰(542)
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	杨兴梅(583)
论抗战时期医学高校的迁川.....	黄 茂(611)

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批判

王介平*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已经出现了改良主义的先声。经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在中法战争失败、作为外国侵略中国的支柱的洋务运动开始破产的条件下，改良主义的声势日益壮大起来。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完全破产了。在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之下，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变法维新运动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到了最高潮。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公车上书，算是第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转化为政治运动，对于“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①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然而，历史嘲笑了变法维新，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促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的革命浪潮不断汹涌，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益革命化，使改良主义迅速地落在革命形势后

* 王介平，1907年生，1950—1985年在四川大学工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37页。